

九月一日

方晓



被驱逐者/弗拉郎科尼

我是9月1日进去的。我妻子到9月11日才来看我，她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红缎蓝花旗袍，头发时髦地盘在脑后，脸上浓妆艳抹。她隔着玻璃拿着话筒对我说，她出了趟差，回来后又急着给我请律师，所以现在才来看我。这么说的时侯，她还用手摸了摸额头，似乎想擦累出来的汗。我说，没关系。她故作轻松地说，你可是一夜成名，现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你的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指9月1日那天我被抓的过程上了电视。她又小心的问我，你在里面没少吃苦吧。我朝她点点头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她看看表说，

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临走她总结道：吃点小苦头没什么，命保住了就行。

9月1日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厅里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几辆警车，下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，还带着一条大狼狗，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走廊上看热闹，周围人议论纷纷，有个小青年说，来抓老李需要这么多警力么，现在这些警察就会虚张声势。老李是我们的副厅长，一个瘦猴似的老头，平时挺和善的，见谁无论大小都开笑脸，但如今他出事了，大家依然看笑话般的呆在走廊里，等老李被拷上手铐从我们面前走过。但很长时间过去，这个期盼也没有

实现，倒是来了两个警察，把我们科长老马名为邀请实为变相羁押地带走了，于是，走廊里的人们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老马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老马神色凝重地回来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脸板得像红铜浇铸成的，我看不明白他眼神中的意思，好像是叫我赶快逃跑，但他嘴上却说，李副厅长让你去一下。我有点莫名其妙，根本想不到这里面还有自己什么事，我有点心虚害怕，脚下也不怎么听使唤，但还是看起来飞快地跑过去。一进门，一个官样的人劈头朝我问，你就是那个经常给老李开车的？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就只得点点头。瞬间，早就潜伏在两边的警察都冲上来把我双手反剪在身后，左边一个还大叫，叫你别动，叫你别动。其实我已经差点吓晕了，哪里还存在反抗的意识，可是他边叫着边把我的左手往上提，疼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一出厅大门，我立刻被眼前的阵势惊得目瞪口呆。四五台摄像机非常近距离地对准我，还有许多照相机的闪光灯，在9月黄昏惨淡的天色里如同四下跳跃的鬼火。我在电视里看过不少这样的镜头，那些可恶的罪犯在庄严威武的人民警察的羁押下，灰头灰脸，战战兢兢，甚至一脸的死色，丧家犬般钻进耀着红色警灯的车里。我曾经设想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，现在我就尽量绽开亲切的笑容，极力舒展眉头，使脸上露出一些喜气来。我想，今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这档节目的应该有我的妻子，同事，和散布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一些朋友，甚至还会有曾与我有过瓜葛的某些女人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，这不是李副厅长，人群便如潮水般向厅内涌去，瞬间所有记者一走而空，我竟然觉得有些失落。

我第三天才被提审，那是一间小得可怜的屋子，进去时里面已经有两名警察，他们在抽烟，屋内就像故意用湿柴点燃熏的一样，呛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审讯开始了，年老的先发话，他问过我姓名职业年龄后就直奔主题。他问，7月17日那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我说，想不起来了。他说，你再想想。我拧着眉头，假装思索，然后告诉他确实想不起来了，

都隔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说。年轻人训斥我，叫你想你就想，想不出来你也给我想。我突然像灵光乍现似的猛一拍脑门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我和李副厅长在一起。年老的马上扔掉手中的烟，问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喝酒啊，然后我开始不慌不忙地编故事，我们一直在喝酒，那天晚上我们连续喝了五六个小时，就我们两人，都喝醉了，所以刚才一时没想起来。你们为什么要喝酒？那段时间李副厅长老婆跟他闹离婚，非常苦闷，就找我喝酒。喝酒后你们还干了什么？没，什么都没干，喝酒后我们就搀扶着回家了。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？我又假装想了一阵子，然后说实在想不起来了。他们叫我再想，当然最后我还是告诉他们我想不起来了。

进来的第一天我就想明白了，厅里早就传言李副厅长手脚不干净，但以前几次险情都被他动用关系化险为夷。警察之所以抓我，肯定是他咬定某一个关键时刻他一直和我在一起，这样他就不可能去干别的事情，而我也只要咬定那一时刻我确实和他在一起，就又可以再救他一次。

然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明白这次有点不一样，这次想撬倒他的人一定大有来头，说不定就是厅里也对第一把交椅虎视眈眈的赵副厅长。所以警察们受人嘱托，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我妻子走后第三天，才来律师把我领了出去。那时，我的右腿已被打得不能灵活了，走路姿势纠正不过来，竟然瘸了。他看着我一言不发，表情严肃得要向下掉肉渣。我当着那些警察的面叫嚣着要告他们，但没有人理睬我，包括律师，因为谁都知道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回到家的当天晚上，我妻子特地地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我还喝了一点酒，吃完之后我想和她亲热，我在里面呆了那么多天，当然想了。可她毫不掩饰地看着我的右腿，说不习惯。既而她又解释，在我进去的那么多天里，她一个人睡惯了。她指着朝南的小房间，说你先睡那里吧，等我习惯了你再过来好吗。虽然她是商量的口吻，但态度却不容置疑。我于是抱着被褥一个人睡到朝南的房间里，这原是给

孩子预备的，然而我和妻子结婚四年，仍然没有孩子，她说太忙，要孩子完全是累赘，再说，孩子不就是延续你们家的香火，而你那些兄弟早为你们接上了，你还劳那个神干吗？她讲的不无道理，何况这种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想要就可以生出来的。在这个朝南的小房间里，我睡不着，难免触景生情，就开始设想如果有了孩子我们的生活会怎样，我会买一把玩具枪给他，然后天天做他的靶子，我还会把我小时候玩的，现在城市里几乎绝迹的玩具全部做给他玩，我想着自己竟都笑了起来，猛然我意识到想象里并没有妻子，她不喜欢有孩子，我不禁有些忧伤起来。

我妻子是个体户，这两年生意越做越大，成天天南海北地跑，几乎没有连续三四天呆在家里的。我还是出租车司机的时候，辛苦地追了她两年，她没给我露过一个笑脸。后来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了李副厅长，我认定他是可以改变我命运的人，就过年过节一个不拉地往他家跑。有一次，他到县里去突击检查，想避人耳目，不好坐公家车，就叫我送他去。可刚进县城就给盯上了，四五辆黑色逞亮的车，每辆里面都坐着几个戴墨镜穿黑西装的家伙，李副厅长的秘书还说看到了他们有枪。李副厅长也心慌起来，他嘴里虽然不停地说，他们绝对不敢胡来的，但我从后视镜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发抖，整个人也僵硬地挺直在那里。我知道，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到了。我对李副厅长说，你坐好了，就一踩油门，飞速地开起来。我在完全不熟悉的小县城里居然把那些车全给甩了。此后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就成了李副厅长的心腹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借招聘人员之机把我弄进厅里，专门给他开起小车来，我从此也成了公家人员。

接下来，追我妻子就没什么难度了。她是个大忙人，每天接电话不下20个。这天晚上，我想着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迷糊中又听到她的手机响了。曾经有一次我跟她闹着玩，乘她不备抢过电话，我喂了一声，那边没有动静，我又喂了一声，那边就挂掉了，紧接着是一阵忙音，我抓着手机愣在那里，她毫不在意地说，肯定是打错了。我想问得更清楚些，但她显得很不耐烦地

朝我挥挥手就出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。我中午下班路过一个大学校园，被里面传来的一曲熟悉的萨克斯吸引住了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进去，里面的每张面容都纯真干净而且似曾相识。忽然天上乌云密布，低压在树梢，虽然是中午，但黑得像夜晚一样，光打雷没有闪电，而且很长时间都不下雨，我就在黑暗的校园里踟蹰走着，想寻找一个能够躲雨的地方。这时有一辆白色的豪华小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。我听到了一阵似乎熟悉而放浪的笑声。我隐约看见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的是一个穿红缎蓝花旗袍的女人，但一闪而过，我看得不真切。

后来，我被渴醒了，外面在下着大雨，夜雨击打在窗台上的声音清脆而令人惊恐。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弹，但说不上来我身体的哪个角落里萌发出一阵轻微的生理冲动，我试图压抑下去，但发现欲望坚韧而执着，我想起以前美好的夫妻生活，就决定去看看我妻子熟睡中的身体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她卧室，却发现床上空空如也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问她，她说她也口渴，又不想烧水，就跑到楼下24H超市去买水喝了。

在家里休息几天之后，当我一跛一拐瘸着腿走进厅里时，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吃惊，他们眼睛盯在我的右腿上，像看一个怪物一样。我腼腆地同他们打着招呼，他们也朝我干涩地笑着，有人眼里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。我听到两个人在我身后窃窃私语，活该，不该他扛的也扛。另一个说，真傻到家了，也说不定，别是他自己也犯事了，不然不会打成这样。

如果这次我腿没有被打瘸的话，可真赚大了。当天调令就下来了，说鉴于我腿有问题，不适合在运输科继续工作，而且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，作为照顾，把我调到财务处。下午，我在科里收拾东西，就我的工作性质来讲，东西少得可怜，只有喝水的杯子，几本破书和其他的一些小杂物。科长老马凑到我边上来，面色凝重地说，你真的想好要过去吗？我朝他晃晃手里的调令，意思说这种事不是我可以做主的。他继续忧心忡忡地说——表情像个预

言大师——那可是个不一般的处室，我们这种人是未必相处得来的。我明白老马没讲出来的那层意思，但我没有再让他讲下去。李副厅长这次不倒，接下来极有可能提正，他乘机提早把我安排进财务处说不定便是为日后所用，还可能是些不正当的用途。但我不能这样想，我朝老马友善地笑笑说，无论怎样，这也算我的一个机会吧。我这么说老马也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。科里有人提议吃一顿，欢送欢送我。我拒绝了，老马的话，让我觉得心里有沉重的东西在压着。

待日子又平静下来，我不由地回顾起自己的英雄史迹，在我所知的范围内，好像只有刘少奇当年被红卫兵逐出中南海时，有我四月一日傍晚面对摄像机，也是面对整个国家机器时难得的从容。我真像动乱年代里的革命家一样，入狱，经住了考验，出狱便提干。以前，我只是一名司机，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。我每天拖着一条瘸腿准时上班，和处里的年轻人争着去打开水，每天也只坐在那里，干些极少的抄写材料，填写表格，或整理档案的活儿，但自觉活得很舒服。我开始学李副厅长，逢人就笑，是那种平等的，不卑不亢的笑，和以前不一样。一个周末，我还去商场买了上档次的黑色夹包，此后，每天上下班都夹着它，虽然里面通常不过是一包烟和几张卫生纸。

我问过妻子可看了9月1日晚上的电视，她说她没看，我说想跟她讲一下当时的感觉，我很想表达给她听，但她说她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听，她确实很忙，时不时要出差，而且一去就是半个多月。我妻子出差时，我的生活就更有规律了，中午吃食堂，晚上回家胡乱凑合，就洗脚看电视，我以前只对体育节目感兴趣，现在却对什么法治在线案件追踪特来劲，一旦庄严威武的人民警察押着罪犯出现在镜头上时，我就瞪大眼睛注视着罪犯的表情，发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惶恐不安，我就越发自豪越发得意起来。我想，在9月1日的晚上，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些曾经与我有过或深或浅交往的女人，她们肯定很伤心，但又绝对为我骄傲。我把电视来回搜了几遍，都没有能看的节目。我拿出扑克一个

人玩小猫钓鱼，后来又给我妻子和自己算命，算了几次都发现她比我活得长。我实在百无聊赖，就挨个给我以前的朋友打电话，发现他们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。有了便携的手机，反而觉着距离更远。我站到阳台上吹风，看着满城辉煌的灯火，突然有被世界抛弃在一个角落里的感觉。于是，我决定到楼下一个大排挡喝点酒，路过公用电话亭时，突发奇想给我妻子打电话。通了，她在那边嗲声嗲气地问，谁啊。说真话，我跟她结婚四年，还没能听过这样的声音，一听我骨头都酥了。我赶紧说，是我。她语气马上恢复了正常，你这么晚还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我说我想她，然后就没词了，那边半天都没有声音，然后听她漫不经心地说，她也想我。我突然有些激动，我请求她，再用刚才那种语气跟我讲几句话。她态度很凶地骂了句变态就把电话挂了。她是我妻子，我想听一下她的声音也有错？之后有几天晚上，我实在无事可干，就给她打电话，可她几次都关机了。

现在我每天习惯性地照镜子，厅里每个楼梯转口都有很大的穿衣镜，我总是假装不经意地瞄着自己在里面或站或走的身姿，我发现我整个右边身子像塌下去一样，右肩比左肩要矮矮很多，右膝盖的地方向右侧突出，以致两个小腿根本无法并拢。走路时，右腿就像拖了沙袋一样，几乎只能平移，而无法抬高。有一次，我忘记这回事，从五级台阶上一跃而下，这在以前，实在太小儿科了，但这次我竟然摔倒了，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吃屎。那天，我很伤心，有几次还流下泪来。

我和每个城里人一样，除了妻子，还有几个相处得来的异性。结婚四年，妻子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未变化，我始终认为她肯嫁给我，简直是一种施舍。现在我一个人想起当初追她的情景，真令人神往。我曾经在这个城市的一条街道上见过我的初恋情人。9月的一天，我站在天桥上看黄昏的风景，匆匆忙忙的下班人流使得城市就像一个巨型的蚂蚁窝。这时，我在右侧的人行道看到了她，她随着一伙人在慢慢行走，虽是多年没见，但我还是一下子就

把她认出来了，因为现代都市里没有谁会和她一样扎两根麻花辫，而且前面还有整齐的刘海，她走路时不抬眼睛的习惯依旧没改，我根本不用担心她会发现我。我就站在高处看她走近，再走远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没有想到要和她相见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们就再没有联系过，只是辗转得知她在我们老家对江的一个乡村里教小学。

这天快下班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，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李副厅长的前任情人。我压低着声音说，你打电话到办公室里干吗？她明显对我的不高兴很害怕，哭的声音都带出来了，说想见见我。我觉得妻子在我心里的地位不可动摇，和个别女人见见也没什么。我答应了她，约好地点，就收拾东西夹着包下班了。以前，我经常开车送李副厅长去她那里，她三十几岁，长得可以说如花似玉，有种古典的风韵。李副厅长总是交代我就停车在那里等，因为不论一点两点，什么季节和天气，他从不在那里过夜。我开始还坐在车里听歌想想他们会干些什么，会怎么干，最后想着自己都觉得没意思。当时，我跟她没有任何交往，连话也没说过几句，通常是她把李副厅长送出来，照例嘱咐我要小心把他送回家。后来，我觉得她怪可怜的，她都算不上二奶，因为李副厅长从不在她那过夜，说难听点，她充其量不过是个被包养起来的妓女。几个月后，她势必被抛弃，李副厅长还算仁慈，可能也是怕做得太绝她会找麻烦，房子没要回来，就不清不楚地让她住着。这似乎让她还怀有某种期盼，她经常打电话向我哭诉，但我也帮不了她，我不可能再开车把李副厅长给她送过去。她还比较仁义，我进去时她去看我，并带了不少的水果和香烟，出来后她还是第一次和我联系，而且直接把电话打到办公室。

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赶到约定的茶楼时，她的身边已经坐着一个男人，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出他们亲密的关系。男人满脸的书生气，谦虚地对



《绿生大厦》插图/克·汉德生

我说他是在读博士，尚未婚娶。我也朝他友好地笑笑。乘我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她跟过来问我那男人怎么样，我说好。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说，她是真的找我来参谋的。我也诚恳地说，读书人好，书读的越多，越坏不到哪儿去。我看她眼睛里还遗留着受伤的影子，顿了顿，我说，他真的蛮好。

回到家，一切与我早上出门时完全一样。妻子还没有回来，我躺在床上，外面的街灯在房间内投下斑驳的亮影，黑暗中我突然觉得有些悲伤。我想起那个晚上，某种脉脉的温情再次鼓荡在我的胸膛深处。我闭上眼睛想睡着，然后做一个梦，在梦里把我们的关系再往前发展一步。那天傍晚，我已经下班回到家，她打来电话说想见我。我骗她说，我妻子在家。她在那边幽幽地说，是这样啊，但又不挂电话，我

能想象她哀怨的脸庞上挂满了失望。想了想我还是答应去见她。

我们坐在一家徽菜馆里，满桌子菜都几乎没动，我们聊了很多，像两个孩子似的大喊大叫。我才知道她的家乡就在我初恋情人教书的地方，我们还相约一起去看她。我们聊了童年、山岭、炊烟、小河、月亮和水牛这些与城市完全绝缘的东西。最后她告诉我其实今天是她生日，来城市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给自己过生日。我也有些激动，立马跑到附近的蛋糕店里给她买了一个大而精致的蛋糕。我发现，这种激动的感觉挺好，我有很多年没有品尝过这种激动的滋味了。然后我建议去公园坐坐，在路上把剩余的蛋糕全部给了一个老乞丐。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都不说话，默默地注视着一对对情侣，老人和孩子。我想起自从和妻子结婚后，我们还没有一起逛过公园。夜风中泛着透骨的寒意，她裹紧了薄薄的衣裳，向我坐近了些，我说不行我们回去吧。她闭着眼睛说，她喜欢这种感觉要多坐一会儿。后来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，竟然睡着了。那晚临分别时，她低着头跟我说，如果我没结婚或者她没有和李副厅长好过，也许我们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。她这样的话说得我酸溜溜的，对于我这样再无足轻重不过的一个小人物，任何一个女人的关注都是我莫大的幸福，她又说，我有没有结婚都无所谓，如果她没跟李副厅长好过就行了。说完求证似地看着我，我能说些什么。我说不嫌弃她吗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我进去时她来看我哭得真伤心，我想如果9月1日她看了那档节目的话，坐在电视机前的只有她一个人是为我真悲伤。我不知道我那故意绽放的笑容能否使她稍微放松点。如果9月1日我没有进去，说不定我们后来还有故事。但现在，连这些事情都模糊起来，我想不起来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，还只是我的臆想。

从我进财务处以后，和李副厅长再没怎么联系过。几次在走廊上照面，也只是简单地寒暄几句。有次他喊住我，跟我握手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，就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走了。处长老杨认为我这人

够意思，私下里跟我说，救了李副厅长的命，还豁出去一条腿，就换来财务处的小职位，不值。我一笑置之。说真话，我倒心满意足，何况我并没有拿腿换前程的想法。我只是觉得李副厅长既然相信我，我就不能出卖他。老杨说，你这是愚忠。我说，愚忠就愚忠吧，总比不忠好。处里还有个同志老张，刚四十出头，留着很流行的山羊胡子，一张红脸上满是青茬，好像他从来都刮不干净，有时候上面甚至还冒出一两颗醒目的青春痘。从我进财务处他就很不高兴，因为厅里当时正在考察他，很多小道消息都传言他有可能被提为副处长。但他一直认为李副厅长把我安排进财务处就是跟他抢班夺权。我跟他话很少，实在避不开了才应付几句。

一天中午，我在办公室午休，妻子出差在外，我一个人也懒得回去。一个同事的女儿整个中午都在走廊里闹腾不休，本来我还有的一些睡意也全给赶跑了，我躺在硬邦邦的桌子上侧头看窗外的天空，城市的天空灰白灰白的，像掺杂着许多透明的垃圾一样，远没有乡下的深蓝和澄清。快上下午班时我都没有睡着，一直在那孩子的吵闹声中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李副厅长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我赶紧起来。他说，上厕所路过这里，看门没锁就进来看看。他又问，中午没回去啊。我说妻子不在家一个人回去也没意思。他仿佛沉思了一下，摸摸脑门说，那正好，基层来人了，今晚有个饭局，你回家一个人呆着没劲，一起去吧。我说，我去合适吗？他说，没什么不合适的，你不去才不合适呢。

晚上，一桌子都是李副厅长家乡的人，也不知李副厅长事先跟他们打了什么招呼，他们轮番向我敬酒，看我喝得差不多时，一个头头模样的人才站起来说到正题，他说，家乡需要建设，县里又筹不上资金，请我帮忙想点办法。我看着满桌子琳琅满目的菜肴，觉得很对不住他们，从心里认为他们不容易，为了民众福利而不是中饱私囊也要如此绞尽脑汁费尽心机。我朝他们笑笑说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科员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哪有能耐帮你们。这时，李副厅长插话说，上面不是刚拨下来救灾预备

款吗，你先从中开十万就把他们打发了，以后再想办法补上。一桌子人都连声附和，我脑袋一激灵，胃里猛地一热，哇的一口当场吐出来。然后我就顺势伏在桌上装醉了。

“十·一”长假的时候，我妻子依然没有回来。她打电话说生意还有两三天才能谈完，然后她要顺道去看一个老同学。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房间里蒙头睡觉。我已经习惯了睡朝南的屋子，小而温暖，一个人呆在里面也不觉得冷清。我看电视，拖地，看闲书，做菜做饭喂饱自己。百无聊赖的时候躺在床上听班瑞德的钢琴曲想着写自传。我开始思念乡村，连续几个晚上都做着相似的梦，已经模糊的儿时伙伴的面孔在梦中又渐渐清晰起来，醒来时我还能逐个叫出他们的名字，我们一起穿过树林翻越山坡上到草地与邻村的孩子们厮杀，夏夜里高唱着信天游在月光下的池塘中捉鱼。到十月五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不能在家再呆下去了，这样下去我真会成为臆想狂了，家里些微的动静都让我联想起童年的事情，而且景象那么逼真，宛如历历在目一样。这天傍晚，我决定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

我买票进去，才发现里面多是情侣，或一家几口，这让我感觉自己不像已经结过婚的人，应该是连恋爱都没谈的懵懂少年。电影放的是一部悬疑片，情节却并不引人入胜，完全是靠光效和音响刺激着观众的感官，这是现代消费下的必然产物。开场十分钟左右，影院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送两个人进来，在手电筒闪烁的红光中，我觉得那个女的走路姿势有点像我妻子，他们就坐在我前排的右侧。几分钟后我终于确认她就是我妻子，她嘴里不停的嗑着瓜子，还偶尔朝那男人笑。后来，她似乎累了，伏在男人肩膀上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我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似乎是她走错了位置，她本应该坐在我边上，对着我笑，然后累了就把头伏在我肩上沉沉地睡去。我想，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出差，她一直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，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，只是那个男人不是我。

后面假期的两天，我漫无目的地在电影院附近转悠，我坐在茶楼二楼靠窗的位置对街道目不转睛的守候着，我企图再次见到我妻子，我确实看见她几次，她一直挽着那男人的胳膊，就像刚结婚时挽着我的胳膊一样。有一次就在茶楼下面，我妻子与男人嬉笑打闹，然后像鸟一样跳开，那男人大叫着去追她。

我不怪妻子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。在我看来，我妻子的神情表明她是幸福的，这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。

我向处里请假，说瘸了的右腿越来越疼。老张兔死狐悲地问我，是不是留下了后遗症。我说好像是。老杨说请长假得直接找李副厅长。中午我进李副厅长办公室时，他正在午睡，我准备退出来，他醒了，问我什么事。我把理由说了一遍，他二话没说就批了条子，他说那天晚上，但看看我的腿，就没再说下去，挥挥手让我离开了。

我决定去乡下看老牛的老婆和儿子小武。老牛是我在看守所认识的朋友，他曾嘱托我去看她们，当时他刑还没有判下来。我出来后又去看了他一次，他问我是否已经去过，我说没有，等工作稳定下来才能找时间去。他暗着脸，神色中满是无以排解的忧伤，沉默着不说话。我向他保证一定尽快去。我问他要不要写封信让我带去，他说不用了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又说，看看就行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跟我说客气话让我更加难受，我不再说什么就出来了。几天之后，老牛的判决下来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老牛执行死刑的那天早晨，我坐在火车站前面高高的台阶上。昨天夜里一场大雨，把城市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我抱着膝盖长久地注视着，衣着光鲜的人们朝各个方向行走，几根粗大的烟囱向天空深处输送着浓烟。我突然意识到这无比清爽的表面之下掩藏着什么，这种感觉让我陌生和不安。这时天空中又飘起了细雨，我站起来向站内走去。

老牛家在老山沟里，周围是重重叠叠数不清的大山，每座山都很有立体感，勾

勒着厚实的曲线。走进村口时，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玩游戏，20年过去了，深山里的孩子竟然还玩着和我当年一样的游戏。我问他们，老牛家怎么走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一个五六岁的挂着青绿鼻涕的小男孩，他虎头虎脑，看到陌生人非常的羞涩，怯生生地告诉我他爸不在家坐牢去了。他说话时眼圈红红的，旁边的孩子们也不说话，看我的表情都很伤感，山里的孩子依旧纯朴。

我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她正蓬头垢面地蹲在墙角边，手里握着木瓢，里面装着半瓢米糠，准备等旁边的猪吃完了再添加到猪槽里。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女人也会有奸情。我刚说明来意她就破口大骂起来，后来又自顾自地说，我不要他来看我们，他为什么不去死呢，他死了我们倒自在。我等她停下来，告诉她，老牛已经被枪毙了，她听了愣在那里好久，半晌才哇哇叫的哭出来，小武也害怕地抱着她，娘俩哭成一团。我没有劝他们，转身去门外，蹲在墙角抽烟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让小武带我去后面的小山上，他问干什么，我说要看炊烟。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石头还保持着白天太阳照射的温热。这时，山下许多家的炊烟已经袅袅升起，没有风，炊烟直直地上升，到了很高的地方，才四下散开，变淡，然后与暮霭融在一起。能闻到柴火的香味。小武指给我看，说那是他家的炊烟，我问他是不是也经常看，他调皮地对我点点头，又补充说今晚的柴火是他拾的。我摸摸他的头，他突然问我，他爸为什么会坐牢。我当然不可能跟他说他妈妈跟别人有奸情，而他爸激怒之下把那个男人给杀了。我想了想，然后告诉他，他爸是进监狱卧底去了，我问他，卧底你懂吗？他非常自信地点点头，说他们经常玩那样的游戏。

晚上我去村口小店买了瓶酒，那女人做了不少的菜。我和小武把竹床抬到稻场上，点了几支蜡烛，如霜的月光倾泻下来，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惨白的。我给两个杯子每次都倒满，朝虚空与老牛对饮。那女人在边上一直小声的啜泣。

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我留了五千块钱在枕头底下。小武送到村口，又

送我翻过了一座山，才回去。我想顺路去江边的那个乡村看看我的初恋情人。

我乘车，过渡，再乘车，徒步翻山，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那所小学。已经是晚上了，我找到校长，跟他说明来意。他接过我递上的烟，抽着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我不敢再发问，等着他开口，后来，他眯起眼睛问我，你跟她什么关系？我想了想，说，同学。他似乎顿时轻松了起来，说，她死了。洗衣服的时候跌倒在河里就再没上来。我觉得脑袋像是受到巨大的外力撞击，快要爆炸了，眼前直冒金星。我颤抖着问他，什么时候的事。他说，四月里的一天吧，黄昏。我想起那天傍晚在天桥上看到的景象。

回到城里，我正常上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天李副厅长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。我进去后，他把门关上，给我递烟，我没事，他就自己猛抽起来，抽到一半，他仿佛下定决心似的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紧张地看着我说，这回我一定要救他。我不明白，他继续说，我走后，他纠缠不过家乡父老，这么多年也确实没为家乡县里做点事，就和老张合谋做了笔假帐，把十万拨给了他们。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现在上面要来查。老张当初听他话只想升副处长，现在出事了肯定往后缩，他甚至还可以说是受了威胁。我看着他不说话，他说，他实在信不过老张，只有我能救他了。我问他，我该怎么做呢。他早就算计好似的非常利索地说，你就咬定是你挪用了那笔钱，给朋友做正当生意。他向我保证，一定动用一切关系保我出来，他朝我伸出两根指头，说，最多两年。他又要说怎么报答我的话，我止住了他。

我想起自己的人生，突然觉得很失落，很忧伤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就朝他点点头。

回到家，我把所有的财产理了清单，全都转到我妻子的名下，并起草了离婚协议，签上字，委托律师交给我妻子。然后，我就成天呆在家里，等着进去了。

【责任编辑 王永盛】